

亚洲探险之旅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彝藏禁区行

[法] 多隆 著 辛玉 周梦子 叶红 译



亚洲探险之旅

● [法] 多隆 著 辛玉 周梦子 叶红 译

彝藏禁区行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彝藏禁区行/(法)多隆著;辛玉等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7

(亚洲探险之旅)

ISBN 7-228-05000-2

I. 彝… II. ①多…②辛… III. 探险—中国—西南地区
IV. 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338 号

彝藏禁区行

(法)多隆著 辛玉 周梦子 叶红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昌吉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28-05000-2/K·657 定价:15.80 元

公元1486年，一个名叫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葡萄牙人乘船第一次航行到今天的非洲南端。他把他登上陆地的地方叫做“暴风角”。回去后，他向国王汇报，国王说：“不，你发现的不是‘暴风角’，而是‘好望角’。”1492年10月，一位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想从地球上找到富饶的中国、印度，但他的航船却意外地撞到了今天的美洲大陆。1519年，费尔南多·麦哲伦从今天的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探寻到一条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交通线路。于是，这些人便被认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探险家。历史学家把哥伦布看作是“新大陆的发现者”，把麦哲伦称作“最伟大的航海家”。虽然，麦哲伦最终以他的暴行被菲律宾人杀死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发展、提高，重要原因是人类总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各项探索。狄亚斯、哥伦布、麦哲伦所进行的也是一种探索。这种行为就是走前人从未走

过的道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寻求目标。因为这种行为总伴随着自然或人为的危险，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探险”，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称之为“探险家”。

纵览人类的探险史，我们会从中发现探险家的目的、动机甚至机遇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摒除探险家各自的目的和政治动机，单纯从他们的成果和记录下来的知识而言，我们就会相信，探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哥伦布、麦哲伦这些人的探险活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各大洲之间交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互相认识 and 了解。

世界认识亚洲、亚洲认识世界，同样首先是通过一批有勇敢精神的人们的探险活动而实现的。特别是世界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所历途径，都是一样。第一个来中国，并且把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时是中国的元朝。而在这之前，中国晋朝的大僧人法显已经从陆上沿着“丝绸之路”，走到了印度各地及今天的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从海洋上漂到今天的山东半岛。他的动机是取经和参佛，但他身上所具备的却是探险精神。公元7世纪，我国唐朝的、至现在还被世界津津乐道的大僧人、大法师玄奘又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所谓的“死亡之海”、“高原禁区”，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千难万险地从长安走到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历经13年，然后又回到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中国长安。中国的旅行家、探险家的著作，给中国提供了认识外界的知

识,甚至还给印度人认识他们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连他们本国也没有记载下来的实录。请看,事物的因果关系岂不是十分明白吗。

人类依靠自然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繁衍。一个群体,最初形成在一个环境优越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他们被海洋或者高山、大川隔绝,外界想触探他们那儿,就要探险;同样,他们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要探险。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们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在法国举行的'98 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法国人共同欣赏足球明星漂亮的射门。但在人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那些年代,不通过探险是绝对了解不到另一个天地的真正面目的。大至一洲与另一洲,小至一国家与另一国家;此一地到彼一地,此一族到彼一族,应该说都是这样。探险家的实地访问记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场直播”! 到亚洲大陆各地进行过探险,并且写下探险记录的那些人的著作,也是被考察地区地理和人文景观的“现场直播”。

19 世纪的下半叶和 20 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 20 世纪的头 10 年和 20 年里,是亚洲探险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探险者之中,论洲别有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论国别则有英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以及日本人等;论探险者们所从事的专业,则有考古学家、登山家、动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僧侣、地理学家以及记者、旅游者等等。他们的足迹所至,东起库页岛,西到伊朗,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地,南至缅甸、印

度北部。我国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云贵高原无不成为他们探险的目标。这些地方的名山大川、荒漠戈壁、少数民族聚居区、古代城镇遗址无不印下那些外国人的脚印。其中，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古代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地更是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热点。通过这些人的探险和发掘，一批高山被征服了；一些被称之为“生命的禁区”的地方被他们越过了；哈拉浩特、高昌、交河、楼兰、尼雅等一批古代城镇或烽燧遗址被他们挖了又挖，掘了又掘；敦煌莫高窟、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等佛教艺术洞窟被他们考察了个遍。成千上万的文物被发现或挖掘出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举成名，一鸣惊人，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人物；有的人被本国、第二国甚至第三国聘为院士之类的专业职务，甚至为他铸造了纯金像。主要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此人探了“险”，得到了他们国家官方或私人无法得到的知识。

从事物的本质上看，亚洲当然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亚洲的社会进步是亚洲人应当做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也只能由中国人推动。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八九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亚洲，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或北洋军阀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是，今天的亚洲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国的各个边疆地区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亚洲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的边远地区是什么样子？这就不能以今天的繁荣去推测了。比如拿丝绸

之路重要路段的塔里木盆地而言吧，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四周城镇林立，绿洲连片，有高等级的公路和方便的食宿。那么，当年呢？当年是否也是这样的繁荣和发达呢？对此，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那么，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办法只有一个，去阅读研究专著和探险家的见闻吧。而学术专著并非普通人能读到或读得懂，而探险著作就不同了，它大都是见闻、历程的直接记录，好读，有趣，易懂。对于学术界人士不可或缺，对于普通求知者也不是天书。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来亚洲探险的探险家们，大多数人都大块大块的文章，一大部一大部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记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事物。从回首过去、增长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些著作都是难得的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者为数极少。我们所见者仅系凤毛麟角。为了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昨天亚洲各地区，特别是让读者能够广泛地知道昨天的我国各个角落的社会状况和地理景观，我们决定组织一定人力，投入一定财力，把一些比较好的亚洲探险著作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读者。

亚洲探险的著作很多，语种各别，优劣不一。我们所选者皆是那些严肃认真的、知识性、科学性较高的。总之，我们并不是白菜、萝卜一把抓，而是尽量选择其中的最精彩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探险者的看法和我们并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无关宏旨。我们现在不也是经常要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看我们的，那么，

我们听一听昨天的外国人对昨天的我们说些什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这样看待问题，我们的读者和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共识的。

亚洲探险最盛行的时期开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已达到“白热化”程度, 在亚洲地区, 探险家们尚未涉足的角落所剩无几。随着天主教渗入我国西南各省, 英、法、德等国的探险家均注意到未开放的高山地带, 因此, 与汉族殊风异俗的西南少数民族引起了他们的注目。那些居住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一带的彝族、苗族、藏族等“未开放”民族的领地, 被欧洲人视为最危险的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多为欧洲人未曾进入,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中国来不及对之进行近代科学考察的地区, 因此, 这里成了探险家们关注的焦点。

某个地区越是难以接近, 人们就越是想要了解它。或许这些探险者们是想借征服最难接近的禁区险地, 从而达到轰动世界的名人效应。自古以来就对亚洲有浓厚兴趣的法国, 在探险热风的影响下, 其探险活动尤为引人注目, 特别是在他们把越南、老挝、柬埔寨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后, 法国人对与越南毗连的云南, 其注意和着力总比其他国家来得深刻、透彻。法国人对于我国西南

少数民族的研究，就专家著述来看，其成绩也是灿烂可观的，本书可以看做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多隆探险队是以多隆(D'ollone)少校为队长，鲁巴吉(Lepage)大尉、胡勒莱尔(Fleurette)中尉、波依乌(Boyve)军士为队员的四名法国军人组成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调查那些“独立的”、“未开化”的“蛮族”。

1906年12月，多隆探险队在越南的河内登陆，第二年春季到达云南府(今昆明)，在云南府，探险队兵分两路。胡勒莱尔和鲁巴吉前往云南东部“独立的”苗族、彝族领地探查；而多隆与波依乌从云南府出发，北上进入山区。数日后多隆一行渡过金沙江，从那里再北上到达会理后，又继续北上抵宁远(今西昌)，并由德·格布里安神父陪伴，一同踏上了“独立的”彝族禁地。

探险是人类向未知世界所进行的最勇敢、最卓绝的进军，是一项能够展示人类伟力的壮举。多隆是位喜欢到外国探险的人，正如他在书中所言：“探险是一种高级的体育活动，是厌倦了现代文明之平凡的探险家们的一种享受。”正是这位视探险为返朴归真享受的多隆在书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未开放的、与世隔绝的、没有官吏警察的“世外桃源”，而这里的人们却能在世袭村长的带领下，自发地建造出了一座将整个峡谷的水流都拦截住的巨大堤坝——水库，多隆对此赞叹不已。在多隆眼里，“蛮族”们是些“善良、忠实、勇敢的战士”，是“英雄”。作者能主动地去认识大自然，客观地体察周围的事物，

从兴奋、愉悦、恐惧、愤怒、惊异等各种直接的感受中流淌出来的文字，其作品的格调就非同一般。本书的“进入彝区”、“在大凉山脉的中心部”和“从彝区出发”详细地记述了多隆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对中国充满乡愁一般的激情全部体现在字里行间。

当多隆再次出现在金沙江畔时，已顺利地穿越了彝族禁地。1907年6月10日到达宜宾时与德·格布里安神父告别。多隆调整了阵容，进入到下一个行程，沿金沙江而下，在泸州离开水路南下至永宁（今叙永），目的是探查苗族领地，从永宁进入了山区。在此之前，那是个完全不被人知晓的地方，多隆在此发现了彝族和苗族的珍贵资料，接着返回云南府。

“苗寨探险”是记述在云南府与多隆分手的胡勒莱尔一行，他们的任务是探查云南周围的古迹，研究云南东部的彝族人，探查很有诱惑力的贵州的“独立苗寨”。胡勒莱尔一行首先完成了第一项考古学的收集任务，丰富了相关的内容；他一边对彝人进行研究，一边向苗族居住的贵州出发。大本营设在兴义，从那里进入了未知地区，发现了寻找已久的苗族部落。当胡勒莱尔一行与多隆再次在云南府相会时已是9月1日，他们对各自带回的资料进行了分类比较，制定出下一个行动目标为：在彝族领地周围扩大探查范围。11月1日全队从云南府出发，北上经宁远向打箭炉（今康定）前进。

本书之所以称打箭炉为“进藏的门户”，是因为汉藏

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派宗教在这里交融。在此之前他们经过的全是汉人的乡村，听到的是汉语，看到的是汉人庙宇；可从这里再往西走，汉人的东西一去不复返，风景也骤然一变，遇见的是藏人，耳闻的是藏语，映入眼帘的是藏式住宅与喇嘛寺院。由于在打箭炉遇形势不稳定，多隆一行便掉头乘船由雅州（今雅安）到达了乐山，在乐山他们西行登上了峨眉山。见当地居民上山参拜与过去比较，还不如外国人多。从乐山沿岷江逆流而上到达成都，在那休养了一个月后，北上进入荒凉未探查的地区。多隆之所以将这个地区视为西藏，是因为此地所见所闻皆为藏人藏俗。在到达松潘后，他们进入了困难重重的、任何地图都未标出的陌生地带，并在那儿进行探险活动，目的是进入藏人禁区进行探查。所有想进入西藏的外国探险家们都知道，“蛮族”最强的部落就分布在这一带，由于这个原因，尚无一人深入此地。他的同胞杜特雷依，依照朋友的建议选择了一条危险最少的路线入藏，但这条路还是让他与死神拥抱了。因此多隆认为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未知世界”。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多隆一行从松潘出发，进入了艰难的探险旅程。本书“进入藏区”详细记述了他们倍尝艰辛的情况。

从拉卜楞再到兰州，当多隆与伯希和举杯共庆时，探险队终于完成了由南至北的彝藏禁区探险。最后，作者向我们描述了具有“神力的建筑学家”建造的“最完美

的极乐净土”——五台山，与在此避难的第十三代达赖喇嘛。多隆像觐见教皇一般，晋谒了这位“气势雄魄”、“神采飞扬”的西藏法王，并向读者再现了当年达赖喇嘛晋京时的壮观场面。

多隆探险队之所以能顺利地穿越这些禁区，客观上除了探险队拥有令彝人惊叹不已的卡宾枪和极具魔力的手电筒外，还与那些散居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法国传教士们的热情支持及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像德·格布里安神父、杜利神父等，他们是多隆探险队忠实的向导、翻译兼“外交”家。当这些荷枪实弹的洋人闯入长久以来被当地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时，自然引起了当地人的激愤。而每当他们陷入困境之时，都是这些传教士挺身而出，使多隆探险队化险为夷。这些传教士怀着对天主教异乎寻常的痴情，凭借对宗教的信仰，舍去再次回故乡的愿望，抱着在他乡生活至死的决心来到这里，使他们战胜了在异乡异族中的孤独和寂寞。他们的传教很成功，连彝族禁区也有他们的教徒。从另一个角度说，传教士比探险家更具有冒险精神。

书中的这位德·格布里安(Guébriant)神父，曾在四川宁远府居住三十余年，1931年回到巴黎，任天主教外国教会主教。他在1903年曾写一篇《经过未知的中国——罗罗的国土》(A Traverser la Chine Inconnue - Chez les Lolos)，把大凉山的秘密宣告出来。1912年他又和多隆合著《中国的非汉民族的文字》。

多隆在这本探险游记之后,其研究对象着重于考古学与民族学。在考古学方面著有《断碣残碑集》(Steles et Inscriptons Rupestres)、《中国西部的古迹》(Monuments de la Chine Occidentale)及《中国回教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三本;民族学方面著有《中国的非汉民族的史料》(Textes Historiques Concernent Les Peuples Non - Chinois de la Chine)、《中国的非汉民族的语言》(Langue des Peuples Non - Chinois de la Chine)及《中国的非汉民族的文字》(Écritures des Peuples Non - Chinois de la Chine)三本。这三部关于所谓“非汉民族”的巨著,从他所收集的资料,把西南民族的史地语言作了总探讨,成绩显著。为法国人在此方面的研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读者面前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 LES DERNIERS BARBARES, Chine - Tibet - Monglie) (PIERRE LAFITTE & CIE, 1911) (最后的,未开化民族)首译的,原版附 146 张照片和 4 幅地图,我们只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插图。

彝族自称繁多,因地而异,有“诺苏”、“米撒泼”、“撒尼”、“阿西”等,元、明以来史籍称为“罗罗”、“傛罗”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本书将原文的“罗罗”(Lolo)统译为“彝”。其他民族分别按现在的名称译为藏族、苗族、傣族等。

编者肤浅的介绍显然是挂一漏万,书中更丰富、更

精彩的内容有待读者自己去品味。由于时代与国情的不同,我们不可能完全赞同书中所表述的观点,但为尊重原著,故保留了原貌,望读者阅读时要注意鉴别。

译者的话

20 世纪初,一支法国探险队曾历经艰难险阻完成了穿越亚洲腹地的探险考察活动。本书作者多隆少校正是这支探险队的队长,在这本书中,多隆少校多视角地展现了他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并情不自禁地发表了一些议论和随感,由于本书披露了大量当时封闭的大清帝国彝藏少数民族地区鲜为人知的事实,可以想像这在当时一定引起了相当程度的轰动,该书也因此被翻译介绍到不少国家,我们有幸成为 90 年后的汉译本译者。

虽说是亚洲探险,实际上多隆探险队的考察路线只经过了现在的云南、四川、贵州、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等地,最后到达了北京。在他们的行程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并不是高山峻岭、大漠荒原的奇特风景,而是那些在与世隔绝的伊甸园中生活着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欧洲人的眼里,那似乎就代表了原始落后和愚昧贫穷。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对待它。

翻译中,难免要碰到一些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例如“Tibet”的翻译,多数情况下仍翻译成西藏,本书“Ti-